

黄飞立 口述 文靖 执笔

上帝送我一把 小提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無常送我一把手提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黄飞立口述; 文靖执笔.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0
ISBN 978-7-108-03504-2

I. ①上… II. ①黄…②文… III. ①黄飞立—
自传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028 号

责任编辑 朱竞梅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 数 175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我也从小开始学琴，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带给别人的依然是痛苦，为此我感到十分抱歉。所以，我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以为那里必定藏着大秘密，天使让他们与众不同。

——执笔人

目 录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1
I. 以马内利	3
II. 敬礼, 童子军	8
III. 我想学长笛, 父亲买来一把小提琴	17
IV. 我想当医生, 上帝说: “不, 你去搞 音乐。”	38
V. 告别上海	52
VI. 在路上	59
VII. 一笑回头问吉山	65
1. 国立福建音专的三个新老师	65
2. 立记茶室	75
3. 记 Nicoloff 与蔡校长	84
4. “妈妈, Nicoloff 又来啦!” 唐敏南 口述	94
5. 记卢前校长	103
6. 记我的离开	106
VIII. 又在路上	110
IX. 聪明人俱乐部	119
X. 赚钱、赚钱、赚钱	126

XI. 耶鲁大学记事	133
XII. 高压锅、打字机与电熨斗	150
XIII. 在天津	154
1. 难得的“土改”良机	155
2. 记苏联专家	160
3. “就是你，你就是指挥系主任”	167
4. 哦，今天又打倒谁了	170
5. 管弦系做木工活，指挥系办造纸厂	174
XIV. 在北京	178
1. 南线阁忆旧	178
2. 从《嘎达梅林》到《红色娘子军》	181
3. “我是牛鬼蛇神”	187
4. 清风店琐记	197
5. 复校了	199
发烫的青春	209
I. 马思聪、父亲和我	向泽沛 口述 211
II. 安伦小子	黄安伦 汤铭 口述 224
III. 指挥系里的一级运动员	吴灵芬 口述 262
IV. Cello, cello	金毓镇 口述 276
上帝，也送我一把小提琴（后记）	文靖 298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1. 以马内利^①

大概在我三岁时，祖父去世了。那天晚上，父母带着我和其他一些人去东山浸会医院，隐隐约约记得祖父躺在床上。护士忙进忙出，把酒精倒进脸盘里，然后点上火、摇几下，大概是在消毒。当时我还不懂事，只是觉得有趣。关于祖父的事都是我长大以后听大人们说的，不过并没在意，只知道他叫黄在东，贫民出身，受西洋传教士影响，是当地第一批教民，现在广西梧州祠堂里还有他的牌位。本来我的父亲有许多兄弟姊妹，但都散失了，后来再没有联系上。

我对祖母的印象要多一些，三岁以前是她抱着我长大的，我叫她“阿嬷”，她叫我“飞立仔”。她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家庭妇女，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但非常善良，也非常疼我，每天不是给我讲故事，就是教我唱歌、讲顺口溜。比如有

^①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一首“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很长很长，现在我还能一字不漏背下来。记得最后一句：“……箩盖圆，买只船；船沉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番鬼”就是指洋人，那时候我们受列强侵略，这首顺口溜的最后不忘添上一句咒他们。还有那首很有名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首歌当时很流行，那一辈的人都会唱，也是祖母教我的。

在我四五岁时，祖母去世了。那时我依然不懂，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记得是另外一个人抱着我，我一边吃着糖果，一边看送葬的队伍，父母也在其中。

1917年，我出生在广州番禺。其实应该说，我是广西的血统，并且是壮族。但是在旧社会，少数民族受歧视，所以我家从父亲那一辈起落址广东，出来以后不敢说自己是壮族，就都算是汉族了。

民国以前，父亲想考秀才，他对古文、历史以及清朝里的一些事都非常熟，可是不久辛亥革命开始了，并没有考成。父亲也是信教的，为此结识了孙中山周围的一些人，做过外交部长伍廷芳的秘书。所以家里有过一张孙中山就职的相片，后来兵荒马乱的，搬几次家就没有了。

那时候的政治很乱，父母亲的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常

常在饭桌上谈许多事情，像蒋介石、孙中山、邓演达、廖仲恺等等这些名字，我都是听熟了的。有一次听他们说，某某专员在火车站被人行刺，但是没有打中，就逃到车站办公的地方临时避一下，结果走的时候，把公家柜子里的钱都拿跑了。政局里的这些故事很多，所以父亲不喜欢做官，总在家里唠叨，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后来他辞去政府的工作，做了广东、广西两省浸信会联合会的总干事。

我的母亲正相反，她是封建大家族出身，祖辈在宁波。我的曾曾外祖父是个钦差大臣，做过清朝驻广州的盐运使，那是个肥差，所以很有钱。后来广州有两个出名的百万富豪，其中的“王百万”指的就是我曾外祖父，据母亲说，她小时候用的杯子、吃饭的碗都是金做的。但是到我外祖父的时候败家了，因为赌钱。曾经有一次，他一个晚上就把广州整整一条街给输掉了——叫高第街，专门做鞋子生意的，现在也很有名，结果一个晚上就归别人了。所以从我外祖父起，就破落了。

我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放，给自己放了大脚，而且从家庭里出走，到上海给一个医生做帮手，学了一点西医。但那个医生对她剥削得厉害，于是她又出走，到日本学医，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人。原来她叫王素波，留学时受新思想的影响，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翰芙，取“汉虎”的谐音。回国后，母亲大概是在教会里和父亲认识的，后来在培正女子小学做教务主任，也教过家政课。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小孩，上

面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时候广州有好几个教会学校，比如培正、培英。我上的是培正小学，校歌现在还记得：“培正培正何光荣，教育生涯惨淡营，培后进兮其素志，正轨道兮树风声，……”另外还有培道女中、真光女中、协和女师等等女校，当时都很有名。解放后，培正、培道改成了广州市第七中学，培英改成第八中学，直到 80 年代恢复了一些校名，其他的大概就没有了。

1927 年我十岁，母亲因为和舍监意见不合，辞职不干了，带我二姐先去了上海。一年以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小孩也过去，坐一条招商局的轮船，把所有的红木家具都搬上。那时我的年纪小，但表现得很 smart，给箱子、家具编了号，清点起来很方便，一件都没丢。到了上海，我们家就住在闸北一条铁路的旁边，不久，北伐的军队打过来，他们的火车进上海我都有看到。家里一个男佣可能是冒充上海的工人或者怎样，北伐军缴械时，他也去了，并且扛了一挺机关枪回来，把我妈妈吓了一跳，让他赶紧拿走。这是我对北伐军的一点点印象。

父亲在教会办的《真光》杂志里做主编，为了生存，母亲也挂招牌当医生。没过多久，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伍廷芳的儿子伍梯云做了外交部长，又把我父亲拉去做秘书。父亲在南京干了两三年，期间不断地换部长，伍梯云

下台后，父亲离开了一阵，后来又被孙科拉去做秘书。

父亲和孙科以前就认识。过去在广州海边的大衮岛上，教会办了一个麻风医院，在我六七岁左右、父亲做总干事的时候，教会派他和一个传教士到美国为大衮岛募捐，那次打的就是孙科的头牌。后来教会为大衮岛第二次募捐，又派我父亲操办这个事情，还是请孙科领头。当时，孙科在南京做铁道部部长，想拉父亲做秘书，可是父亲不喜欢做官，等募捐的事完了就想离开。于是孙科安排父亲在上海的铁路局做专员，负责京沪、沪杭甬的铁路线（按：“甬”为宁波简称）。所谓“专员”大概就是什么事情都管，也可以什么都不管，具体我就不大清楚了。

母亲做小儿科的大夫，行医几年，总觉得责任很大，经常失眠，所以几年后就不干了，做家庭主妇。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做“简任官员”，那是比较高级别的，相当于现在司局级以上、副部之下的一个级别，所以拿的工资不少，家庭境况好许多，供得起我们五个小孩念比较好的学校。大姐、二姐和我都在沪江大学读书，妹妹在上海音专学钢琴，弟弟先是在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后来也转到了上海音专，大概是学大提琴或者声乐。当时教会学校很贵的，比如我在沪江读书，一年要三百多块，那么几个孩子加起来，家里负担还是蛮重的。到了每年交学费的时候，母亲都要在那里算半天，就是说，也并不那么痛快。

II. 敬礼，童子军

我们先是住在闸北，后来搬到了虹口区，当时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大多聚居在那里。我就读的广肇公学离家很近，就在四川北路，对面是精武体育馆，那是很有名的，我们常进去玩。有天晚上进行一场乒乓球赛，来了几位国手，好多人去看，好像也不用买票，我们小孩子就钻到最前面。那是我第一次看正式的乒乓球比赛，记得有一个球员叫陆汉俊，看他拉球，或者站得很远削球，真是棒极了。

广肇公学是一个在广东会馆里办的小学，条件还不错，大概有近千人，在上海很出名，老师几乎都是广东人，上课也用广东话。毕业后，我在粤东中学读了一年，但那时候大姐在沪江大学读书，她跟我讲：如果在沪江附中读书，以后进它的大学比较方便，要是从外面的学校考，恐怕就难了。所以大姐带我去见沪江附中的校长李好善，问了几句就录取了，并不像现在入个好学校那样的为难。两年以后，姐姐和

我又带着弟弟飞然去见校长，校长指了指弟弟，又指指我，对大姐说：“你的这个弟弟有没有他那么好？”那是自然。就这样，弟弟也被录取了。

就我的经历，当年的小学、中学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比如我在广州念培正小学，校长邝乐生是留美回来的博士，冼星海、马思聪都在那里教过。广肇公学里，教我们国文的老师叫黎锦熙^①，是国民党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普通话咬字很准。教音乐的张亦庵^②，那是和丰子恺、邹韬奋等等一批非常活跃的人在一起共事的，钢琴弹得很好，可以即兴伴奏，还会拉小提琴、吹笛子，摄影技术也很棒，又能绘画，非常有才华。沪江附中的博士更多，校长李好善是留美的，我的物理老师是留美的，还有几位也是留洋的博士，不过现在已经叫不出名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讲课非常生动，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让你觉得有趣。地理课上，老师拿来模具，让我们拼一个完整的中国地图，这个方法很好。还有我们的一位几何老师，可以空手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圈，而且随随便便就能画得圆极了，那真是绝活儿。

①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中国注音字母之父、语言学泰斗。

② 张亦庵（1894—1950）：原名张其诩，广东新会人，著有《藏珠记》、《劫海鸳盟记》，合译小说近六十种，善音乐、绘画、摄影等，一生困顿，1950年病逝香港。

我的几任英语老师都是美国人，一是 Miss Knabe（德语里是“男孩子”的意思，却是位 Miss），一是 Miss Byrd，还有一个 Mr. Carter。这些老师基本上不会中国话，你只能听英语，也只能和他（她）讲英语。课堂上不讲文法——至少没有系统讲过，上来就是标准句，因为都是日常用得到的，我们也听得懂，这叫“direct method”（直接的方法）。有一次 Carter 出题目，让讲一段个人经历，我就写自己一次听音乐，感觉好像进入了一片树林，我用的是“murmur of the forest”（森林的低吟）。而且，这些老师从来都不要求说一天必须背多少个单词，他们觉得那样死背没有意义，但是要看书，选的那些文章也比较适合。就这样，到上大学时，我们已经可以读《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作品，一般的会话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很可贵，平日里老师告诉我们如何做人，不是平板的说教，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比如有一句话在英语里是常见的，“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英语老师对我们说：“You can fool a person one of the time, and som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你可以欺骗某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众人好几次，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再比如有一句话，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叫做：“Do what you like, and like what you do.”（做你所爱，爱你所做。）这个“爱”不是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爱，

而是需要你认真投入的那种“爱”，或者叫做“热爱”。如果你觉得这是好的、有意义的事情，你“爱”它，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同样，一旦你决定去做了，那就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做好。这里既有“爱心”的“爱”，又有“敬业”的内容，含义相当丰富，而且影响了我一生。

现在我们虽然有一个“素质教育”的提法，但并不能很好地贯彻，音乐、美术只作为小课，随时可以取消、占用。可我上小学的时候，书法、美术、手工、音乐都是正式课程，每个礼拜都要上，而且上得规规矩矩。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提法，“德、智、体、群、美”五育都要发展，而且是真正正地实行。

我们的书法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教的，从临颜体开始，王羲之的字也临过。我的父亲喜欢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也在家里教我们“吊笔”。美术课从素描开始，除了油画没教过，水彩、水墨都上过，用炭笔抹浓淡，画花草、画竹子，最高兴的是到郊外写生。虽然我画得不怎么样，但顶喜欢写生了，偶有佳作，也被贴堂展示过。手工课上学刻图章，拿一小块石头磨平，在上面刻反写的字。做木雕、做竹雕，在荔枝核上刻一个面孔，鼻子、眼睛一点点挖出模样来。另外还用藤编筐子、编篮子，教过钩毛线。我给自己钩过一顶帽子，冬天顶在头上，挺得意的。

从小我就喜欢运动。每天清早起来，带上钉鞋到虹口公